中國文學研究　第五十四期
2022 年 7 月　頁 215～254
臺 灣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系

在家國社會與作家個人之外：廢名小說集《桃園》、《棗》人物主體性之浮顯*

邢　辰**

提　要

本文以「個體」為論述焦點進入廢名 1927-1930 年間的兩部小說集《桃園》、《棗》，析論廢名消弭家國社會的政治意識形態，以及自己作為作家的「個人主義」，進而關懷小說中的人物個體，並賦予其主體性之「客觀」書寫。文章首先在「感時憂國」的脈絡下審視廢名回應三一八慘案之小說，以廢名對孤獨的先覺

本文 110.09.11 收稿，111.01.15 審查通過。
* 本文為筆者碩士論文《生命-詩-生活：廢名的文學追索》（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22 年）第二章部分研究成果。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三年級。
DOI:10.29419/SICL.202207_(54).0006

者個體的同情與理解展開論述其對知識分子個體的關注。文章然後進一步由廢名書寫知識分子日常生活之小說，探討廢名對知識分子個體思考之轉變，即由前期作為社會的知識分子之同情、理解轉向了對身為普通人的知識分子在日常生活中的糾葛、齟齬之反思。文章最後由廢名「客觀」之文學觀帶入其鄉土書寫，在兩重視角的鄉土——純美與破敗之中呈現相對「客觀」之鄉土，並使用敘事學與小說修辭學理論探討廢名所採取的主動退後、與人物保持一定距離的寫作方式，使得人物作為獨立「個體」得以浮現，亦由此具備了「主體性」。

關鍵詞：廢名、《桃園》、《棗》、個體、主體性

A Discourse on Characters' Subjectivity Emerging in Fei Ming's *Peach Garden* and *Date*

Xing Chen*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word "individual" is used as the basis for a discussion of Fei Ming's two books, *Peach Garden* and *Date*, which were written between 1927 and 1930. Firstly, the paper analyzes short stories that reflect March 18th Massacre that occurred in Beij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bsession with China". Fei Ming's sympathy and understanding for intellectuals is presented as the origin of his concern for individuals. Secondly, the paper discusses how Fei Ming's concern for intellectuals transformed, his focus shifting from intellectuality as social identity to intellectuality as a personal identity. This discussion centers upon short stories that describe intellectuals' daily lives. Finally, the "objective literary concept" will be used to discuss how characters

* M.A.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in Fei Ming's writings about his homeland attain subjectivity and develop into independent individuals.

Keywords: Fei Ming, *Peach Garden*, *Date*, subjectivity, individual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在家國社會與作家個人之外：廢名小說集《桃園》、《棗》人物主體性之浮顯

邢　辰

一、前言：「自我」以外的生命

《桃園》、《棗》是廢名（原名馮文炳，1901-1967）繼《竹林的故事》之後出版的兩部短篇小說集，其中收錄了廢名於 1927-1930 年間創作的若干短篇小說，自此之後，廢名轉向長篇小說寫作，因此《桃園》、《棗》亦是廢名除卻首部小說集《竹林的故事》之外惟一的短篇創作。但與飽含青春知識分子豐沛情感的《竹林的故事》不同，[1] 寫作《桃園》與《棗》的廢名不再關注自我作為知識分子的苦悶、憂鬱情緒，反而跳脫出以作家為中心的視角，在書寫中關注小說中人物的主體性，並以人物為中心，鮮少附加自我的情緒、情感。因此對比《竹

[1] 關於《竹林的故事》之探討，可參考筆者論文：〈從「憂鬱-哀悼」之生命轉向論廢名《竹林的故事》及其創作傾向〉，《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 54 期（2021 年 6 月），頁 41-56。

林的故事》，寫作《桃園》與《棗》的廢名收斂起自我的情感，關注的是小說中人物（如知識分子、農民）的所思所想。對此，也斯（原名梁秉鈞，1948-2013）曾指出廢名這種寫作傾向，並認為其與吳爾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有相似之處，也斯寫道：

> 胡爾夫雖然注重探索人物內心曲折，又實驗意識流技巧以體會角色的心理活動，但她的現代抒情小說卻不是強調主觀的感情流露與發洩，反而很注重細節選擇，景物與內在心境的聯繫。她在《現代小說》一文中，就提出自我的非個性化，以對抗主觀性的表現。她甚至曾經批評喬哀思的《優力栖斯》過分集中在一個「自我」的感受，而沒有探入到「自我」以外的生命中去。[2]

也斯指出吳爾芙在其抒情小說中使用的「自我的非個性化」之方法乃是將自我與外在景物之間聯繫起來，並認為廢名的小說〈桃園〉、〈菱蕩〉等亦具備此種特質。然而，筆者關注的焦點在於廢名如何探入到「自我」以外的生命中去，這個「自我」乃是廢名自己作為作家的「自我」，而「自我」以外的生命則是小說中那些未被作家「自我」所感染的人物了，即是人物作為一個獨立個體在小說中浮現出來。

作為廢名的兩部短篇小說集，《桃園》、《棗》並未獲得學界的注目，反而是後來創作的長篇小說《橋》、《莫須有先生傳》、《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吸引了許多學者的注意，相關論述頗豐。而《桃園》、《棗》作為連接廢名首部作品《竹林的故事》和後續的長篇創作之間的紐帶，廢名在其中隱藏的寫作觀點，是理解廢名前期與後期文學觀念之轉變的關鍵。故此，本文以「個體」為論述焦點進入廢名兩部短篇小說集《桃園》、《棗》，下文先在「感時憂國」的脈

[2] 也斯：〈廢名與胡爾夫〉，《大公報》第 12 版，1988 年 12 月 5 日。

絡下審視廢名回應三一八慘案之小說，論析廢名筆下「感時憂國」的知識分子個體有何特別之處。其次由廢名書寫知識分子日常生活之小說，探討廢名對知識分子個體思考之轉變。文章最後由廢名「客觀」之文學觀帶入其鄉土書寫，探討廢名在鄉土中發現的農民個體，對比一般意義上的鄉土書寫有何不同之處，並由此提出鄉土作為獨立個體的主體性。

二、「感時憂國」的變音：廢名對孤獨個體的理解、同情

晚清以降，由於西方入侵，中國漸從「天下」走向「世界」，在「世界」中謀求自身生存之道的背景下，中國知識分子概將救亡圖存之使命寄寓於小說之上。彼時梁啟超（1873-1929）提出了「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其中「小說界革命」尤為成功，梁啟超學習歐美與日本重視小說的社會功用，提升小說的社會價值，目的在於借小說開啟民智、改革社會。[3] 後來梁啟超在日本創辦《新小說》雜誌，國內各種小說報刊如《月月小說》、《繡像小說》、《小說林》等刊物亦興起。爾後陳獨秀（1879-1942）、胡適（1891-1962）等人開展新文化運動，並創辦《新青年》雜誌，魯迅（1881-1936）作為《新青年》同人雜誌的作者之一，真正開啟了現代小說之寫作。在晚清直至五四知識分子之努力下，小說終攜帶著救治國家、啟蒙民眾之功能取代了傳統詩文的地位，躍至中國文學的中心。晚近夏志清對比晚清、五四乃至中共建國後的小說，他尤其強調現代小說對國家民族的關心，並冠名之「感時憂國」（obsession with China），在〈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中，夏先生寫道：

[3] 關於晚清小說這一文類的興起歷史，可參考陳平原：〈新小說的誕生〉，《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3-7。

> 那個時代的新文學，確有不同於前代，亦有異於中共文學的地方，那就是作品所表現的道義上的使命感，那種感時憂國的精神。當時的中國，正是國難方殷，企圖自振而力不迨，同時舊社會留下來的種種不人道，也還沒有改掉。是故當時的重要作家——無論是小說家、劇作家、詩人或散文家——都洋溢著愛國的熱情。[4]

夏志清將晚清小說《鏡花緣》、《老殘遊記》與現代小說作對比，認為知識分子面對國家、社會的態度由晚清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對傳統儒家觀念的肯認轉為五四的抨擊傳統文化、提倡西學，背後體現的是五四知識分子對中國以儒家為核心的傳統文化之背棄，究其根本則是五四知識分子更為急切的救國之心。回到本文的問題，處於二十年代的廢名如何對「感時憂國」做出回應？在閱讀廢名二十年代散文的過程中，筆者發現 1926 年發生在北京的三一八慘案給予廢名很大的衝擊，他在慘案發生後接連寫了〈狗記者〉、〈俄款與國立九校〉、〈共產黨的光榮〉三篇文章，表達自己對北洋政府的不滿與憤慨。第二年 7 月，張作霖入京，後將廢名就讀的北京大學與其他八所學校合併為京師大學校，遭到社會各界人士的反對，廢名更是憤而休學，以此表示自己對軍閥的反抗，直到 1928 年 11 月北伐軍攻入北京，廢名才復學繼續在北大英文系就讀。[5] 廢名亦多次在小說中表達自己對三一八慘案的關心，其中〈一段記載〉是反映革命運動過程最為全面的一篇。以下將以小說〈一段記載〉為主線，另輔之以〈審判〉、〈石勒的殺人〉、〈追悼會〉三篇小說，探看廢名在「感時憂國」的浪潮中如何開展他的書寫。

[4] 夏志清著，丁福祥、潘銘燊譯：〈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389。

[5] 參考陳建軍編著：《廢名年譜》（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63-73。

在〈一段記載〉中，廢名以一個師長作為觀察者，講述了這位師長的晚輩小朋友參加學生運動的過程，最終小朋友慘死在西門外，暗示了三一八慘案的悲劇結果。在小說中，廢名寫得頗為隱晦，以「雨」象徵黑暗的社會現實，又用「傘」隱喻學生的「武器」、反抗的意志與能力。隨後在晚輩與師長的對話中，牽引出救治國家、強壯民族之使命：

> 「先生，我立刻借得了一把傘。」
>
> 「那很好。」
>
> 我連忙說。但我頗奇怪。
>
> 「先生猜我向誰借的？」
>
> 他又是那樣的冷笑。
>
> 「你應該向這誰道謝就是了，我以為。」
>
> 「倘若這誰就是我之母呵！我到底沒有『來』，無所謂『去』！那麼眼淚還是眼淚，依照大家的意見寶貴下去！——哈哈哈，我見慣了陳列館為牠備了各樣餌品的猴子！」[6]

小朋友的反抗之姿正是為了不做陳列館的猴子，而他所謂手中之傘乃是從母親處借來，意指生養他的土地本來就給予了他反抗的意志與能力，而他的反抗亦即是為了保護這片土地。

在小說〈審判〉中，我們可以更為清晰地看出廢名對為何學生、民眾會走上革命運動之路的理解。〈審判〉全篇以犯人自述為何會走上革命之路為主要內容，廢名將犯人的生平寓言化，他在一周以前坐洋車去學校上課的時候從車上摔下來，腦袋破了，洋車夫卻跑掉了。由此可見，犯人成為革命黨實在是短短一

[6] 廢名：〈一段記載〉，《桃園》，收入王風編：《廢名集（第 1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92。關於《桃園》、《棗》之引文，以下採取隨文註。

周的事，而他革命的起因「腦殼破了」是在暗示社會的黑暗、人心的腐化，如同魯迅的〈狂人日記〉、〈藥〉、〈阿 Q 正傳〉，在在是寓言式的寫法。〈審判〉中犯人的個人經歷正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的寓言，一個普通的學校中人（學生或是老師）在短短一周之內有感於黑暗的社會現實，被迫走上革命之路，這個犯人不是普通的一個犯人，而是所有革命者的縮影，是廢名以其經歷來概括所有革命者的反抗。而廢名接下來對犯人參加革命運動緣由之剖析亦是象徵性的、寓言式的。在廢名看來，社會的問題不是一下就出現了的，實在是和流轉的歷史、和千千萬萬不知名的個體息息相關。犯人自述：

> 法官，你忍耐一下，聽我說下去，這實在於我的犯罪很有關係，好比這春天的樹，你看牠綠得茂盛罷，但去年冬天括大風下大雪時候的樹，切不要忽略看過，缺少了那一天，甚至缺少了那一刻，也許牠現在不能夠這麼綠。（頁 177）

一棵春天的綠樹來源於冬天的大風大雪，過去的經歷塑造了如今的綠樹。歷史亦是如斯，在犯人眼中，跌下洋車腦殼破了即是冬天的風雪，今日的革命則是春風中搖曳的綠樹。當法官問犯人和革命黨人張三是否同謀，犯人否定了法官的問話，槍斃張三的時候他還在醫院縫腦殼。在〈共產黨的光榮〉中，廢名就激烈反問了參加革命運動的一定是共產黨嗎，[7] 言下之意政府腐敗、社會黑暗，參加革命運動的人甚多，豈獨共產黨？回到〈審判〉，當犯人陳述完「犯罪」動機之後，以身體自由之名要求法官盡快裁決，「法官想：犯人大概以『死』也為身體的自由」（頁 180），又寓言式地道出了革命志士對自由、平等、民主的追求。

〈審判〉中的犯人之死以寓言式的書寫展示了革命黨人義無反顧的慷慨之氣，而〈一段記載〉中的小朋友之死卻充滿了悲慘與淒涼。原因之一在於這位小

[7] 參考廢名：〈共產黨的光榮〉，王風編：《廢名集（第 3 卷）》，頁 1192。

朋友在西門外參加反抗運動，卻遭到政府屠殺，在西方帝國侵略中國的背景下，中國人殺了中國人，廢名以及社會各界人士對三一八慘案的發生皆痛心疾首。故在小說〈石勒的殺人〉中，廢名直接使用故事新編的形式，以寓言呼喊中國人不能殺中國人。〈石勒的殺人〉來源於歷史上石勒排墻殺王衍之典故，廢名改編後，石勒殺王衍的關鍵成為了洛陽人。此洛陽人是個不與世俗同流合污之人，他看穿了士大夫的虛偽奸詐，終日於山中捕兔，是個孤獨的清醒之人，後跟隨石勒，幫了石勒很多，石勒遂對他言聽計從。所以當石勒抓住了王衍一行人時，洛陽人不想要石勒殺死他們，屢屢勸之，更是在石墻倒向王衍的時候大喊「這都是我的國人」。廢名以洛陽人對國人的憐憫之心諷刺北洋政府對學生、民眾的屠殺，並呼喊中國人不可殺中國人，其中承載了他面對三一八慘案無限的悲哀。

〈一段記載〉中小朋友死之悲慘，其原因之二在於小朋友之死沒有得到民眾的理解，甚至有人以污名詆毀之，小說結尾民眾對小朋友之死冷言冷語：

> 「一定是居心謀殺人！」
> 「非示眾三天不可！」
> 「自然要示眾。」（頁 194）

於此，這位師長不得不發出「我很躊躇，留在世間還有——筆呵，我把你收藏起來嗎」（頁 194）的無奈慨歎。在〈狗記者〉這篇小文中，廢名即以激烈的言辭諷刺了為段祺瑞政府作倀的新聞媒體，直稱其為狗記者，對諸家媒體消費三一八慘案死者之行為的憤恨之情溢於言表，正正呼應了〈一段記載〉中學生的鮮血與慘死被民眾的唾沫所淹沒。而在〈追悼會〉中，廢名直接指出追悼會乃為紀念三一八慘案之追悼會，可是到會的主角北山卻直言這不像是追悼會，倒像是展覽會了，主席的發言、會場的輓聯通通讓北山感到厭煩，甚至他在追悼會中途爬出去到雪地裡散心。廢名所寫的這一場追悼三一八慘案的會議早已失卻了追悼

之意，形式大過內容，革命者的鮮血是去年之事，今年的追悼卻成了紙上之哀。小說的最後，北山似乎也想通了：

> 演說的大概只能說這樣的話，做對子的大概也只能做這樣的對子。因了哀而想說，因了哀而想寫，想說想些便忘記了哀，想說想寫就是了。（頁174-175）

諷刺的是，北山原為追悼三一八慘死者而來，回去之後卻收穫了一個小說題目「追悼會」，結尾的北山在心裡追悼北山自己更是諷刺了追悼這一行為的虛偽與無力，指出了廢名面對死者的悲涼心情以及對社會的無能無力之感。

在以上所述小說中，〈審判〉、〈石勒的殺人〉二篇最具「感時憂國」特徵，尤以其濃厚的寓言氣息為著。在夏志清對中國現代文學之「感時憂國」精神的論述中，他通過舉例沈從文（1902-1988）的《阿麗思中國遊記》與老舍（1899-1966）的《貓城記》詳細闡釋中國現代文學之「感時憂國」精神，也就是批判傳統社會泯滅人性、壓抑個性之「吃人」內涵。由此我們發現，「感時憂國」精神興發的書寫大多以寓言為主，無論是沈從文在《阿麗思中國遊記》中以阿麗思和兔子之眼觀看中國傳統社會的落後、不人道，還是老舍以《貓城記》中外星球貓國諷喻中國人的醜陋百態，他們皆是站在一種宏觀的、整體的視角上來審視並勾勒傳統的中國。雖然廢名的寓言書寫處理的是三一八慘案中的群眾革命運動，其所反抗、諷刺的是其時的北洋軍閥統治，這跟當時的社會背景不無關係，從第一個十年到第二個十年，危機感已由西方的強勢侵略轉變為國家內部動蕩，但背後的「感時憂國」精神，卻是一脈相承的。

這樣的「感時憂國」精神可以用詹明信（Fredric Jameson，1934-）對第三世界文學的觀察來稍作解釋。在〈處於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中，詹明信指出第三世界知識分子對「我們」的執著，「我們」背後折射的是他們對

集體、民族、國家的關心。詹明信說相較於美國知識分子，他在第三世界知識分子身上常常看到他們談論自己的國家以及「我們」這一集合詞。[8] 易言之，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最關心的是國家的命運，他們反復追問的是自己的民族應該怎麼做，如何在世界的經緯中生存、並趕超歐美大國。這當然折射了這些知識分子以西方為中心的思維模式，這是帝國的強權政治所決定的，他們身處其中亦無能為力。當詹明信從對第三世界知識分子的觀察轉移至文學中時，他發現第三世界的文學有一種寓言性，詹明信寫道：

> 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來好像是關於個人和力比多趨力的文本，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關於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到衝擊的寓言。[9]

詹明信特別以魯迅的〈狂人日記〉、〈藥〉、〈阿 Q 正傳〉為例，闡述了五四小說的寓言特徵。最終，詹明信將對第三世界文學中的寓言性之思考上升至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層面。詹明信認為，在第三世界文學中，知識分子的作用應該受到重視，而第三世界中的知識分子永遠都是政治知識分子！[10] 讓我們回顧一下前面提到的梁啟超、陳獨秀、胡適、魯迅，不可忽略的是，在中國現代文學的形成過程中，知識分子確實佔據著主導地位，而現代小說的政治功能亦被他們所強調。如果說「感時憂國」的書寫呈現為一種寓言書寫，其背後隱含的愛國精神來源於知識分子作者的道義感、責任感，那麼對於廢名而言，他的「感時憂國」書寫僅止於〈審判〉、〈石勒的殺人〉二篇。在〈一段記載〉與〈追悼會〉

[8] 〔美〕詹明信著，張京媛譯：〈處於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美〕詹明信著，張旭東編，陳清僑等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年），頁 423。

[9] 〔美〕詹明信著，張京媛譯：〈處於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頁 429。

[10] 同前註，頁 434。

中，他並未將故事寓言化，在兩個革命者犧牲過後，小說中的民眾並未對其抱以同情、理解，兩篇小說共同傳達出廢名對革命運動的哀歎，也反映出廢名對革命運動本身的不信任、悲觀、失望態度。由此我們發現，廢名雖以寓言書寫表達他的「感時憂國」熱忱，卻在具體的寫作中呈現出對孤獨的革命者、先覺者等孤獨個體的同情、理解。這是廢名不同於其他作家的部分，亦是廢名在寫作中將視線移至「個體」的開端。

三、知識分子個體的另一重身份：在日常生活之中

在這裡，我們先就文學中的「個人主義」稍作梳理，以便更好地理解廢名小說中對「個體」的關懷。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1906-1980）在〈中國現代文學的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中指出中國現代文學的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為作家對個人生活、個人內心的關注、書寫。[11] 簡言之，作家由外部世界走入內心世界，書寫內心經驗，形成一種獨白文學。在這裡，作家強烈的個性和情感得以抒發，作品中隨處可見作家之「我」的影子。因此「個人主義」文學具有明顯的作家個性、作家風格。「個人主義」本起源於西方，旅行至中國後雖發生了一定變化，[12] 但在文學文本中宣示的仍然是作家個人的解放、個性的發揚。易言之，

[11] 參考〔捷克〕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中國現代文學的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捷克〕普實克著，李歐梵編，郭建玲譯：《抒情與史詩：現代中國文學論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0 年)，頁 1-26。

[12] 蘇敏逸考梳「個人主義」的「旅行史」，指出中國文學中的「個人主義」起源於西方，但在移植至中國的過程中發生了本質上的轉變：西方的「個人主義」源於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與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的宗教改革，個人脫離了家庭、階級與教會的束縛、控制。但中國則不同，與西方「個人主義」對個性之強調乃在於追求個人的絕對獨立不同，中國的「個人主義」其解放個性之目的乃在於強大整個國家。蘇敏逸這樣總結：「對西方而言，『個人』和『社會』是站在對立的位置，個性的張揚表現為拋棄（也可以說『逃離』）社會、征服社會或對抗社會；但對中國而

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個人主義」具有強烈的作家個性、作家風格，郁達夫（1896-1945）的〈沉淪〉、丁玲（1904-1986）的〈莎菲女士的日記〉，皆是如此。雖然廢名在前作《竹林的故事中》亦有個人主義之表現，但到了《桃園》與《棗》，青春的作者成長為成熟的作家，廢名在此時漸漸隱退自己作為作家的個人的感情，在小說文本中，更加珍視、關心人物自己的主體性。

對於廢名而言，他珍視的是小說中作為獨立人物的「個體」，而非他作為作家的自己的「個人」。讓我們回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武斌斌在〈廢名與魯迅：「主觀」的選擇與「無意」的影響〉中指出 1927 年對於廢名與魯迅的重要性。武斌斌認為，對廢名來說，1927 年奉係軍閥入京，而後廢名的休學並隱居北京西山規約了他的創作並影響了他的歷史觀。[13] 其實不啻 1927 年，自二十年代以來的一系列革命運動都影響著廢名，正如前一節所述，發生在 1926 年北京的三一八慘案亦給廢名極大的衝擊。但是我們看到，在慘案的接連發生中，廢名的思索依然建立在革命者的個體層面上。他在小說〈一段記載〉中專注於「小朋友」革命者的刻畫，盡顯其孤獨、悲涼處境；而小說〈追悼會〉則盡現革命的荒誕與悲哀。在散文〈閒話〉中，廢名便隱喻了自己對於現狀與革命的形而上思考：

> 新近我才明明白白的懂得一個道理。其實只是一句老話：「日光之下無新事。」花樣自然是層出不窮，日日翻新，如果我們站得遠一點，拿個

言，中國的『個人』意識產生於新舊夾縫的時代，『個人』所反抗的只有舊倫理、舊思想等一切屬於封建時代的舊事物，『個人』和『社會』是站在同一邊的，個性的張揚是為了養成健全的個人，只有健全的個人才能成就社會的改造。」參考蘇敏逸：《「社會整體性」觀念與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發生和形成》（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7 年），頁 32-33。

[13] 武斌斌：〈廢名與魯迅：「主觀」的選擇與「無意」的影響〉，《中國文學研究》第 4 期（2016 年 4 月），頁 89。

> 顯微鏡照一照，看出牠依然是那一套貨色。這個豈能自喜？亦不必生悲。事實是這樣，無可如何的。[14]

這段文字隱喻了廢名對於其時革命運動的看法，可見廢名已經跳脫出當權者與革命者的二元框架，站在了一個更遠的距離看待當時的社會與政治。而在武斌斌的觀點中，1927 年魯迅受清黨事件影響，因而走上了親近群眾的道路，在武氏看來，這即是廢名與魯迅分裂的關鍵，因為廢名之前對魯迅的親近建立於其對魯迅作為一個獨立的清醒個體之孤獨、寂寞的同情與理解，而當魯迅走向群眾，勢必告別了個人，即「丟掉了自己」。[15] 由此我們看到，當廢名身處二十年代「感時憂國」背景之下，他的書寫一部分回應了作為知識分子「感時憂國」之使命，但在「感時憂國」大框架下的書寫中，他更為關注的是「個體」。二十年代的社會變革使廢名看到的是革命者的辛酸、革命結果的不如人意、以及這一系列運動在社會現實中顯現的荒誕效應。可以說，廢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決定了他創作前期對於社會清醒者、革命者「個體」的同情與理解，而二十年代中後期革命運動的失敗使他對「革命」這一救國形式抱持不信任態度，繼而對社會失望、對政治灰心，亦由此關注到知識分子的日常身份。因此，廢名這一時期對「個體」的關注較前一階段發生了質變。前一階段廢名同情、理解的「個體」是社會上孤獨的知識分子、革命者等等率先清醒之人，易言之，廢名理解的「個體」是胸懷國家、民族的「感時憂國」之士，這些人是社會的「個體」，並不具備自我的日常的身份，魯迅即是其中之一。而經過了革命運動的失敗，廢名轉向的對「個體」的關注乃是日常生活中的人，其中對知識分子生活的書寫亦脫

[14] 〈閒話〉為廢名在《駱駝草》雜誌開闢的一個專欄，其本意乃諷刺陳源的《西瀅閒話》，此段文字刊載於《駱駝草》1930 年 5 月 26 日第三期〈閒話〉，乃廢名〈閒話〉的第一篇。參考王風編：《廢名集（第 3 卷）》，頁 1205。

[15] 參考武斌斌：〈廢名與魯迅：「主觀」的選擇與「無意」的影響〉，頁 89。

離了知識分子之社會身份的束縛。我們看到，廢名此時的書寫著重於知識分子的個人身份，展現後者在日常生活中的糾葛與齟齬。

在〈張先生與張太太〉中，廢名敘述了在北京當大學教授的張先生與其妻子張太太在妻子「小腳」問題上的齟齬。張先生作為大學教授，其身份自然是知識分子，故其在家庭之外反對封建傳統、宣揚民主科學等西學精神。但當他回到家庭，面對著封建傳統之「餘孽」的太太的小腳，其心情之複雜可想而知。特別的是，張太太亦是接受了西學的女性，但小腳已成既定事實，無法更改，故張太太看到了伺候自己的僕人以及在她看來打扮奇怪的滿族婦女的「大腳」時，深深地感到了自卑。需要明曉，張太太在不知道僕人以及滿族婦女沒有纏過小腳之時，她的地位是遠在她們之上的，但一雙大腳卻將張太太壓到了塵埃裡，讓她自愧不如僕人以及滿族婦女。在此，「腳」成為了一種象徵，小腳的女人是封建的、傳統的，在民眾已經接受西學的大環境下，她們既被社會上的其他人所看不起，亦被自己鄙視。這就牽引出了張先生與張太太生活上的彆扭與矛盾。小說中共寫到張太太照相與張太太洗腳兩件事，張太太的小腳是他們夫妻心中共同的隱痛，身為知識分子的張先生不知如何面對象徵封建思想的親密之人太太的小腳，作為知識分子之妻子的張太太亦以自己的小腳為恥，不願丈夫注視自己的雙腳。廢名極為細膩地描寫了張先生與張太太這對夫妻幽微而複雜的心緒：

> 張先生那天夜里對太太提議：
>
> 「明天我引你去照像，照一個半身像。」
>
> 說時只有自己覺得自己可憐。
>
> 張太太是一個聰明人，從小就稱為淑女，不過識不得字。答話只輕輕的一句：
>
> 「我也多時說照哩。」
>
> 說時很自慚，覺得對不起張先生。女兒金兒夾在懷裡。

「我說我同金兒兩人共照一張好，金兒坐在我腳下。」太太慢慢地又說。

「不，金兒要照另外照一張，小孩子就照全身。」

中間頗經了好大的功夫，總之張太太現在是發惱：

「我不照，當我死了！」

「……」

「我再也不要我的金兒裹腳！」

這句話並沒有說出，只是這麼想。大概人總是不大肯示弱的。然而張太太眼淚汪汪流。（頁 145-146）

照相本來是要照全身像，但張太太小腳露在外面「不好看」，於是張先生提議照半身，可當張太太知道張先生不讓自己照全身像的本意後（雖然她自己也不想把小腳露在外面），她還是生氣、難過於丈夫對自己小腳的偏見，最終張太太也沒能照相，照相館卻成了夫妻二人心上的創傷，時時提醒著他們張太太的小腳如何不為社會所容。

另外，張太太作為南方女人有每晚洗腳的習慣，自然她不在張先生面前洗腳，而是趁著張先生睡覺的功夫「趕緊解散洗，可憐，汗流浹背，——她怕她的張先生又走進來。」（頁 147）然而張先生卻對太太的心情了若指掌，他知道太太怕自己看見自己的小腳，對這樣幽微的心理張先生感到難過，可以說，張太太的小腳已經成為了社會政治的犧牲品，它橫亙在張先生夫妻二人之間，社會生活介入了日常生活，使得張先生與張太太夫妻失和。張先生有意挽回二人感情，要求太太把裹腳布解開睡覺，增加夫妻間的親暱與信任，但張太太自卑的心又如何允許自己的小腳赤裸在丈夫的面前？如此，〈張先生與張太太〉這篇小說折射了知識分子在普通的家庭生活中所遭遇的挫折，這是知識分子這一特殊社會身份在面對私人生活時的不可避免性，知識分子如何在社會上搖旗吶喊改造社會、救治國家，當他回到家庭，他的日常身份凸顯，他不可能對自己的家人大加

撻伐，然而其社會身份卻不能完全卸除，由此知識分子的頭腦影響了其與家人的相處，在與家人的相處中產生重重矛盾。

〈張先生與張太太〉還是知識分子與家庭的齟齬，〈李教授〉則呈現了知識分子面對傳統倫理對個人的要求之無可奈何。〈李教授〉講述了在「打倒智識階級」之口號下，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李教授一天之內的憂慮心情。「智識階級」即為知識分子，「打倒智識階級」則是國民革命時期中共一方提出的口號，此口號一經提出思想界反應熱烈，1925 年 12 月周佛海即撰文對此大加議論：「他們——共產黨黨員——以為智識階級是反革命的，是無用的。要革命，就要在乎勞農階級，他們現在極力主張階級鬥爭，不但是勞農與資本家鬥爭，還要主張勞農與智識階級鬥爭。」[16] 正如周佛海所述，「打倒智識階級」是中共階級理論主導下產生的一個不成熟、不成功的方針，張文濤亦指出，「『智識階級』，其本身缺乏統一。同為『智識階級』中人，其名譽地位、政治立場，可能相距千里之遠。」[17] 李教授就是這樣一個普通的「智識階級」，名譽地位不是很高，政治立場亦不鮮明，李教授之所以被劃歸為「智識階級」乃在於他的工作——大學教授。實際上李教授很愛惜自己的教授身份，他喜歡別人稱他為李教授，然而在「打倒智識階級」之大背景下，李教授這個默默無名的「智識階級」的力量是十分薄弱的，他沒有能力去駁斥，在時代的洪流中，大的口號、大的方針政策，牽連、抹殺的正是像李教授這般的平素眾人。〈李教授〉正寫出了「李教授們」被時代所裹挾的幽暗心情。

[16] 周佛海著，英延齡筆記：〈國民革命中的幾個問題〉，《覺悟》，1925 年 12 月 16 日。轉引自張文濤：〈國民革命時期的「智識階級」論爭——從「打倒智識階級」的口號談起〉，《人文雜誌》2014 年第 9 期，頁 81。

[17] 張文濤：〈國民革命時期的「智識階級」論爭——從「打倒智識階級」的口號談起〉，頁 83。

在李教授的一天中，他先去報館投稿，出報館後又遇到同鄉，在與報館編輯、同鄉的攀談中，李教授無可避免地總要講到「打倒智識階級」之問題，李教授一方面不同意「打倒智識階級」之口號，可此口號成為風行社會，李教授一將自己的心聲托出，即被自己正是「智識階級」之真相打臉，而在「打倒智識階級」之社會中，李教授又似比別人矮了一截，自覺形穢。可以說，李教授既想維護「智識階級」的名望與尊嚴，亦在大洪流中不能獨善其身，因此，李教授是非常的憂慮了。爾後在理髮館理髮的過程中，李教授由剃頭聯想到兒時自己頭上長鬍鬚不能留辮，母親要求剃頭師傅用快刀給自己剃頭，李教授害怕剃頭流血，又想起小時正逢辛亥革命，看過殺人砍頭之畫面，一系列意識流反映了李教授在「打倒智識階級」之背景下對自身命運的擔憂。[18] 小說的結尾，李教授安慰自己實在別無他法便回鄉，但家鄉的封建落後又令李教授黯然神傷。在此，〈李教授〉與〈張先生與張太太〉一致反映出了知識分子面對家庭、面對傳統倫理的孤獨感，這是知識分子這一群體回歸日常生活不可避免之傷。

二十年代中後期，西學已漸進中國，人們的思想發生變化，但那仍是一個新舊交替的變幻時代。而在這樣的時代中，處在社會最前線的知識分子肩負改造社會、救治國家之重任，而當他們轉身面對家庭、面對倫理，成為一個「個人」時，其不被家人、倫理所理解的孤獨感油然而生。對此，魯迅的〈幸福的家庭〉、葉紹鈞（1894-1988）的〈潘先生在難中〉均有所著墨。但對魯迅與葉紹鈞來說，書寫知識分子之家庭生活乃是他們創作中的少數，他們書寫的重心依然是「感時憂國」，而廢名的寫作重心卻在此，應該說，廢名真正關心、在意的乃是小說

[18] 李教授在理髮館的沉思頗具哲學性，可與廢名詩作〈理髮店〉「理髮店的胰子沫／同宇宙不相干／又好似魚相忘於江湖。／匠人手下的剃刀／想起人類的理解／劃得許多痕跡。／墻上下等的無線電開了，／是靈魂之吐沫。」作互文理解。參考王風編：《廢名集（第 3 卷）》，頁 1577。

中獨立的個體，因此他實際上是在書寫知識分子之家庭生活中凸顯知識分子個體，並呈現這些個體在面對家庭與倫理時的孤獨心情。

四、「客觀」文學觀：發現鄉土中的農民「個體」

廢名在《桃園》與《棗》中對知識分子個體的思考經歷了從社會的知識分子到日常的知識分子，而廢名之所以能夠關注到知識分子的主體性，原因在於廢名一方面卸下了政治眼光，另一方面亦避免了自己作為作家個人情感的介入。對於前者來說，廢名多次在散文中表達自己對文人政治性的不滿。廢名在其為《周作人散文鈔》所作的序中便提到中國的文人擺脫不了古代「士」「學而優則仕」之傳統，諷刺文人對政治的熱情。[19] 在散文〈今年的暑假〉中，廢名再次提及文人的政治性：

> 我曾同我的朋友程鶴西說，文人求不朽，恐怕與科學制度不無關係，就是到了如今的嶄新人物，依然難脫從來「士」的習氣，在漢以前恐怕好得多，一藝之長，思有用於世，假神農黃帝之名。伯牙子期的故事，實在是藝術的一個很好的理想，澈底的唯物觀，人琴俱亡，此調遂不彈矣。[20]

在廢名看來，文人的政治性與立功、立名、立德傳統有關。而廢名作為一個文人、一個作家，他的文學觀則是超越意識形態，這裡面既包含了政治意識形態，亦涵括了情感意識形態。雖然不乏「堅持非意識形態亦為一種意識形態」之看

[19] 廢名：〈《周作人散文鈔》廢名序〉，王風編：《廢名集（第 3 卷）》，頁 1276。
[20] 廢名：〈今年的暑假〉，王風編：《廢名集（第 3 卷）》，頁 1286。

法，最著名的當屬魯迅對廢名的批評，[21] 然而這只是駁斥堅持文學本位的「詭辯」。傾注政治意識形態的文學，如二十年代興起的左翼文學，其第一要義為政治，其次才是文學，因此在左翼文學中，文學成為了政治的工具，亦應和了文學工具論。然而對於堅持文學本位者來說，如果說他們的堅持亦是一種意識形態，那麼這個意識形態便是文學本體，在這裡，文學等同於人、人生，等同於生活，獲得了本體地位。對於廢名而言，他的文學觀不僅拒斥政治意識形態，亦排除作家個人情感的意識形態：

> 悟到古今一切的藝術，無論高能的低能的，總而言之都是道德的，因此也就是宣傳的，由中國舊戲的臉譜以至於歐洲近代所謂不道德的詩文，人生舞台上原來都是負擔著道德之意識。當下我很有點悶窒，大有呼吸新鮮空氣之必要。這個新鮮空氣，大約就是科學的。於是我想來想去，仿佛自己回答自己，這樣的藝術，一直未存在。佛家經典所提出的「業」，很可以做我的理想的藝術的對象，然而他們的說法仍是詩而不是小說，是宣傳的而不是記載的，所以是道德的而不是科學的。[22]

所謂「道德」即是帶著作家自己的政治、情感眼光、在寫作中傾注自己的政治意識、情感傾向，廢名認為這樣的文學是意識形態的，即是不客觀。簡言之，對於廢名而言，不管是政治宣傳的文學還是抒發作家個人情感的文學，都是道德的、宣傳的，即是不客觀的。因而，廢名所想要付諸的文學是超越意識形態的，沒有「道德」，沒有宣傳，廢名認為「科學」最接近自己的想法，而後周作人反駁廢名「科學」亦具有意識形態。[23] 不談科學的意識形態性，其時廢名之所以借「科

[21] 參考魯迅：〈勢所必至，理有固然〉，收入陳振國編：《馮文炳研究資料》（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 年），頁 173。
[22] 廢名：〈知堂先生〉，王風編：《廢名集（第 3 卷）》，頁 1300-1301。
[23] 參考廢名：〈知堂先生〉，頁 1301。

學」來闡述自己的文學觀，乃在於他認為「科學」是一種客觀的思維模式。因而在他看來，文學應該脫離一己的意識形態性，也就是不受作家主觀上的影響，因此我們看到，廢名在其為人所稱道的鄉土小說中並未發揚普實克所謂的「個人主義」與「主觀主義」，用自己的鮮明個性渲染小說、影響人物，而是自動與小說保持了一定距離，突出小說人物個體，亦未如傳統的鄉土書寫以知識分子啟蒙視角批判鄉土、用政治眼光看待鄉土。在廢名的筆下，我們看到鄉土不僅是純淨的、唯美的、良善的，亦是破落的、殘敗的、腐化的，易言之，廢名書寫的鄉土具有多副面孔，並不是主觀的、單一的。因此在廢名對鄉土之人的細膩刻畫上，展現了鄉土人的主體性。故此，下文將分別從廢名書寫故鄉的美麗面與醜陋面論述之，進一步闡釋其在鄉土的純淨與破敗之中發現的鄉土「個體」。

（一）純淨、平淡的鄉土

廢名小說中的鄉村總是有一條緩緩流淌的河流，河上一座橋，遠處一座塔，河邊的竹林亭亭玉立，隨風簌簌，偶爾有人在橋上走過，安靜的世界像水一般純淨、唯美。這是廢名所懷念的、難以忘懷的故鄉之美。

小說〈菱蕩〉描寫的正是這樣一個地方，河、橋、塔、竹林俱備。在小說中，廢名著力突出了菱蕩這個地方的純淨之感。菱蕩上的陶家村有一個小廟，小廟有一片白墻，廢名言「城裡人有終其身沒有向陶家村人問過這廟者，終其身也沒有再見過這麼白的墻」（頁 208）。「這麼白的墻」即沒有一絲絲灰色、黑色，是純白的墻，沒有雜質的顏色，給人純淨之感。菱蕩的水亦如白墻般純淨，廢名寫道：

> 菱葉差池了水面，約半蕩，餘則是白水。太陽當頂時，林茂無鳥聲，過路人不見水的過去。如果是熟客，繞到進口的地方進去玩，一眼要上下

> 閃，天與水。停了腳，水裡唧唧響，——水仿佛是這一個一個的聲音填的！（頁 208）

正午的時候，茂密的樹林沒有一聲鳥叫，站在河水邊，過路人看不到水之流動，即是「不見水的過去」，水之清澈、透明仿佛和天空一個顏色、一個模樣，水中映天，人看不到水在哪裡，只有水的流動聲、魚蝦的游動聲，諸種聲音使人感到水的存在。這樣純淨的河水、這般寧靜的樹林，廢名筆下流動出的菱蕩，真是一個純淨得唯美的世界。此處還是敘述風景之美，接下來，作者由菱蕩的風景之純淨蔓延至人物之樸實——小說的主角陳聾子。陳聾子其實並不聾，他只是很少說話，對於別人的講話反而很認真在傾聽，因而大家都叫他聾子。此處陳聾子的少語甚至是不語，恰與菱蕩的寧靜形成呼應，在廢名的審美眼光裡，少語的人是憨厚的、樸實的，這是他所認同的人性之美。陳聾子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在二老爹家做了十幾年長工，二老爹很信任他，他又熱情、善良，當他正在蘿蔔田裡勞作，過路人還未討要蘿蔔吃，他已經笑嘻嘻地拔了一顆蘿蔔給你，「菱蕩圩的蘿蔔吃在口裡實在是甜」（頁 209）既是廢名對菱蕩這個地方肥沃的純淨的風土之感歎，亦是對陳聾子善良的純樸的人格之讚美，從中我們感受到的，是作者對菱蕩這個地方的無盡的熱愛。

〈菱蕩〉全篇堪稱情節的只有結尾部分陳聾子在菜園裡澆完青椒時坐在河邊抽煙，河邊的幾個洗衣女人中的張大嫂因天氣熱，解開了衣服露出乳房來乘涼散熱。張大嫂看見陳聾子不害臊羞赧，陳聾子看見張大嫂亦未產生情色之念，他們所展現的，是如菱蕩的白墻、清水、靜林一般的純樸率真的人情，廢名在小說中的一段描寫正好將菱蕩的風景之美與人情之美勾連在一起，形成一幅純淨唯美的畫卷：

> 一日，太陽已下西山，青天罩著菱蕩圩照樣的綠，不同的顏色，垻上廟的白墻，垻下聾子人一個，他剛剛從家裡上來，挑了水桶，挾了鋤頭。他要挑水澆一澆園裡的青椒。（頁 210）

其實，〈菱蕩〉整篇小說即是如斯。在一個河水清澈、樹林寧靜的地方，小廟有一堵白墻，白墻下有一個少言的長工，他善良、樸實、厚道，風景之純美掩映著人性之樸善，共同傳達出廢名對故鄉純淨之美的懷戀。

〈毛兒的爸爸〉則體現了廢名對鄉村中家庭生活平淡之美的歌詠。毛兒家是一個平凡的鄉村家庭，毛兒和他爸爸一樣，身體略微發胖，腦袋後面留一個老辮，嘴巴闊闊的，有時候會被夥伴嘲笑。毛兒爸爸是傳案的衙吏，他媽媽是一個美人，又勤勞又賢惠。每逢有村民來找毛兒爸爸，他媽媽都耐心地招待人家，她在生活中也不記仇、也不抱怨，小說中寫道：

> 她的門外，有小孩子拉的糞，她也不問是誰家的小孩拉的，她認得是對門王金火的糞，她拿了她的掃把把牠掃乾淨。張四嬸子看見了——毛兒叫張四奶，總是忍不住的要心頭納罕：「好賢快的媳婦！」（頁 223）

王金火是上文毛兒提到的欺負他的小夥伴，毛兒媽媽也沒有計較，還是用自己的掃把掃乾淨了王金火的糞。毛兒媽媽這樣的善良、純樸正是延續了〈菱蕩〉中陳聾子的人性之善，這是廢名所讚詠的鄉村人性之美。實際上，毛兒媽媽不計較王金火還有其他小孩子在自己家門前拉糞還有第二層用意：「趙志祥家的又實在不願別人詛咒她的小孩。小胖子也拉糞。」（頁 224）言下之意即是毛兒也會在別人家門前拉糞，毛兒媽媽打掃別人小孩的糞便隱含著她對自家小孩的疼愛。其實，在毛兒與媽媽吃飯之時，媽媽把冷掉了的肉從毛兒碗裡夾出來，叮囑毛兒不要吃冷掉的肉，我們便能看出媽媽對毛兒的疼惜。而在小說開頭的部分，廢名即第一句便寫道：「毛兒曉得他的爸爸疼他。」（頁 219）後面又寫到媽媽以前

疼他，現在則不疼他了，其實由以上分析可以發現，毛兒的爸爸媽媽都很疼愛他，只是媽媽家務繁忙，不像毛兒小時候整天陪他玩，現在則多是爸爸陪他玩。需要明確的是，廢名在這篇小說中塑造的毛兒父子形象並不是讀者理想中的人物，易言之，毛兒和爸爸長得都不算漂亮，前文亦已談過，毛兒和爸爸被稱為大小胖子，廢名在行文中又為毛兒父子增加了滑稽成分，使得毛兒父子頗似喜劇人物，比如寫毛兒的闊嘴像豬嘴，毛兒爸爸在其父葬禮上的滑稽打扮：

> 趙志祥生來胖，很白，那時正是冬天，孝衣襯了棉襖，棉襖襯了短棉襖，又是叫人看的，走路當然動，又不動，所以，大街上，棺材過了，大家一時都不說話，雖然笑，孝子！一個白胖子！——沒有趙志祥。
>
> 趙志祥漸漸的不是叫人看，他那樣脖子不高一下，又不低，仿佛是生成的樣子，不然就不是趙胖子。（頁 221-222）

廢名用略為輕鬆的筆調，其重點不在於毛兒祖父的葬禮，而是用毛兒爸爸的喜劇性消解大的悲痛，呈現出普通人的家庭生活、鄉村的日常性。

小說的敘事亦遵循日常的脈絡，從毛兒在廚房裡玩鬧、媽媽準備飯菜，到媽媽招待來找爸爸的村民、毛兒同媽媽吃飯，及至小說的後半部分，六月的一天，毛兒爸爸躺在樹下睡覺，來了一個剃頭的師傅，他便坐在樹下剃光頭，毛兒媽媽把毛兒叫回來，也在樹下讓師傅給他剃了頭，期間又有賣布的、賣鼓的經過，毛兒爸爸又取耳，一家三口在家門口的樹下共度一個下午，廢名極盡家人共處時的舒適、安閒：

> 剩了他們三個人。竹榻另外一把小竹椅子，趙志祥家的坐了椅子。她是乘涼，兩手抱著膝頭。樹蔭下很涼快。這一刻功夫，她簡直沒有聽見毛兒和他的爸爸說話，說什麼。她望著有涼意的風吹著柳葉兒動，好像採

> 花的蜂兒要飛上花心，兩下都是輕輕的惹著。看她的後影就曉得她很涼快了。這一顆樹上的葉兒都是要來吹著她的眉毛動了。
>
> 趙志祥心頭的舒服不能比擬了。他坐著，毛兒站著，赤腳站了竹塌，駝爸爸的背，同爸爸一般高。（頁 226-227）

廢名分別從毛兒媽媽以及毛兒爸爸的視角寫出了這個夏日午後他們的舒服、享受，這是廢名所讚賞的鄉村下午，與家人一起坐在樹下乘涼，是廢名所懷念的鄉村家庭的日常之美。乃至他在小說的結尾以作者的視角評論了毛兒的媽媽：「她說的樣子美」（頁 228），這亦是廢名對這個鄉村的普通家庭共度一個下午的嚮往，對家庭日常生活的平淡美的肯定。

（二）殘敗、破落的鄉土

凌宇在〈從〈桃園〉看廢名藝術風格的得失〉中指出廢名小說的主旨有二，其一為「表現下層人民平凡人生的悲涼」，其二為「從他們身上探索和表現情感美，靈魂美」，凌宇認為此二者在廢名小說中常常是聯繫在一起的，並指出〈桃園〉即表現了王老大父女的人性的光輝。[24]〈桃園〉講述了桃園主人王老大的女兒阿毛患病，桃子季過去之後，桃園內已無桃子，一天晚上，阿毛在夢囈中說桃子好吃，王老大於深夜中為阿毛尋找桃子，最終買了三個玻璃桃子，卻被街上的孩子撞碎了的故事。其中，小說前半部分以阿毛的意識流交代了阿毛父母吵架、父親酗酒、母親最終病死之家庭前事，天真的阿毛常常在桃園內思索父親為何酗酒、母親又為何與父親吵嘴，童稚的絮語「但媽媽明明知道爸爸在外面沒有回也不應該老早就把門關起來！媽媽現在也要可憐爸爸罷」（頁 198）無疑體現了年幼的阿毛對幸福生活的渴望，王老大不再酗酒、深夜為患病的阿毛買桃子亦

[24] 參考凌宇：〈從〈桃園〉看廢名藝術風格的得失〉，收入陳振國編：《馮文炳研究資料》，頁 198。

表現了在困苦的生活中，王老大對女兒的疼愛之情，這當然是凌宇所謂的王老大父女的人性的光輝。但筆者對〈桃園〉的論述重點則在於王老大父女的悲苦生活，因為這正打破了文學史一貫將廢名歸類為田園小說家之偏見。易言之，廢名的小說並不單純書寫上一節所討論的純淨的、唯美的甚至是平淡的鄉村之美，在懷念故鄉的小說中，廢名亦有展現其悲苦、殘敗、破落的一面。在這裡，廢名的懷舊乃是一種博伊姆（Svetlana Boym, 1959-）所謂的反思型懷舊（reflective nostalgia）。[25] 廢名在此時期對故鄉的懷想中，既存在如〈菱蕩〉、〈毛兒的爸爸〉般純粹美好的記憶，亦直面了故鄉，亦即鄉土的灰暗面，那悲苦的、殘敗的、腐化的鄉村生活。

回到〈桃園〉，表面上廢名在這篇小說中營造了一個如〈菱蕩〉一般的美麗的地方，桃園裡生長著茂盛的桃樹，桃樹結了紅色的大桃子，阿毛還在桃園的墻根邊種了牽牛花，一個善良的、可愛的小姑娘裊裊娜娜地生活在一片桃林中，好一幅嬌俏的田園畫卷。但實際上，王老大之所以能得這麼一片桃園，乃是因為這桃園挨著殺場，是一個不吉利的地方，沒有人要這片地。而年幼的阿毛姑娘又患病了，身體不好。如此桃園與殺場，可愛的阿毛與患病的阿毛互為表裡，〈桃園〉美麗的外表之下是哀傷的事實。此外，阿毛與王老大經營著桃園、生活在桃園，可是阿毛深夜的一句「桃子好吃」（頁 201）才恍然讓王老大心疼起女兒來，諷刺的是，經營桃園的王老大不能給女兒一個桃子吃，卻只能用玻璃桃子來望梅止渴，撫慰患病女兒的心情。這是廢名對王老大和阿毛的同情，王老大是賣桃子的人，卻總是被張四騙錢，故而我們看到，在美麗的桃園中，實際上生活著困

[25] 在《懷舊的未來》中，博伊姆根據一個人與過去、與想象中的群體、與家園、與自我感受的關係，指出存在修復型懷舊與反思型懷舊兩種懷舊類型，前者強調「舊」，旨在重建家園及彌補記憶之空缺，後者則注重「懷」，即對過去、對故鄉等的懷想。參考〔美〕博伊姆（Svetlana Boym）著，楊德友譯：《懷舊的未來》（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 年），頁 46。

苦、不幸、受欺凌的父女，而在美與不幸的對照下，王老大父女的哀傷便凸顯出來。

如果說〈桃園〉還有美麗的外表，有著廢名對故鄉唯美的風景之眷戀，〈小五放牛〉、〈四火〉與〈文公廟〉則乾脆拋棄了鄉村中美麗的風土描寫，直接將殘敗的、破落的、腐化的生活呈現出來，並批判處於貧苦生活中的卑劣人性。〈小五放牛〉以孩童小五作為敘述者（narrator），講述了陳大爺、毛媽媽、王胖子三個人的故事。小孩子不懂人情世故，對於複雜的陳大爺、毛媽媽、王胖子三個人的關係不甚了解。他猜想毛媽媽是陳大爺的老婆，但卻看到王胖子堂而皇之地住在陳大爺和毛媽媽家，並且和毛媽媽舉止親密，當小五長大了回想起三個人時，才以成人的慧黠明白王胖子是毛媽媽的情人。小說中的陳大爺是個受盡欺負的男人，小孩子捉弄他，在他大便的時候用石子打他，他老婆毛媽媽亦數落他、支使他，當她的情夫王胖子要喝酒時，毛媽媽便打發陳大爺去打酒，陳大爺在家裡的地位儼然不如一個情夫了，難怪成年的小五稱陳大爺為「烏龜」了。但是敘述者小五顯然厭惡毛媽媽王胖子、同情陳大爺，小說中毫不掩飾地描寫了小五對毛媽媽、王胖子的厭惡之情：

> 王胖子同毛媽媽坐了一個竹墩，毛媽媽翹了腳端她的煙袋。陳大爺門口這幾棵楊柳真是為這兩個胖子栽的！但該竹榻吃虧。兩個胖子，誰也沒有打誰的招呼，誰也就是這樣打招呼：一個偏了眼睛歇住不吹煙矢，一個一眼看定了扇子（毛媽媽的大腿上擱了一把蒲扇）拿過來嘁喳嘁喳的對褲襠裡扇。滿臉油汗，正是捉豬的王胖子，多了一條紡綢褲罷了。（頁216）

小五的眼光之下，毛媽媽同王胖子的油膩醜態畢現。小五對陳大爺的同情則體現在他不參與小孩子們捉弄陳大爺的活動，並且和陳大爺是好朋友，一起玩打

骨牌，王胖子支使小五去打酒，小五不去並在心裡想著陳大爺叫他去他就去，在這「一家三口」中，小五顯然是偏袒陳大爺。敘述者的對於偷情的毛媽媽、王胖子的討厭、對於被欺負的陳大爺的偏心，折射出作者廢名對於夫妻倫理的認同、維護，及其對於弱者的同情，亦是一個知識分子面對社會的良心。因此，小說結尾小五內心反抗鄉村「潛規則」，想要用小孩子欺負陳大爺的石子去打王胖子，維護自己心中的正義，這分明是作者廢名對王胖子、毛媽媽的批判。

與〈小五放牛〉相比，〈四火〉與〈文公廟〉並無一個固定的同情對象，廢名直接呈現鄉土生活的殘敗、破落。〈四火〉中的四火在捉豬腳的時候偷油，他的嫂子在給人接生孩子的時候順走雞蛋，四火丟掉工作之後去城隍廟裡與和尚一起哄騙了上香的鄉下人的一隻雞，從中謀取二百錢，四火的嫂子背著四火給孩子做油飯吃，對四火謊稱家裡沒米只能煮粥。諸此種種，皆是由於貧苦的生活逼現出人的計較、算計等等卑劣的人性。而〈文公廟〉中的教書先生張七收受學生父母的賄賂才對學生有所照顧，人心不古，和尚撿到一條洗澡毛巾，便有人冒領，張七把大便拉在了茅坑外面不敢承認，和尚指桑罵槐，整篇小說氤氳著辱罵聲、抱怨氣，不見絲毫人性的光明，讓人頓生垂頭喪氣之感，與那純美的「菱蕩」簡直是兩個世界，但這卻是真實的故鄉、真實的鄉土，「菱蕩」是，〈四火〉與〈文公廟〉亦然。如果說〈菱蕩〉與〈毛兒的爸爸〉呈現出了鄉土的美麗面，〈四火〉、〈文公廟〉則展現了其醜陋面，這是貧窮的一隅、落後的一隅，由貧窮而為了生活計，而滋生偷竊、拐騙、隱瞞、自私等等人性的陰暗面。對此，作者廢名並未在小說中多加撻伐，他像是一個忠誠的記錄者，如實呈現他記憶中的鄉土，沒有過多的上帝般的同情與批判，[26] 廢名體現出來的，是一個自己人對自己人的理解，對於生活在貧苦中、怨氣中的鄉土人的感同身受。因此對於廢名而

[26] 王曉明指出，《新青年》雜誌的一個特點即是以救世者自居。在《新青年》影響下的魯迅小說，亦體現出救世者之姿態。參考王曉明：〈一份雜誌和一個「社團」——重識「五・四」文學傳統〉，《上海文學》1993 年第 4 期，頁 70。

言，像是四火、張七這樣的人亦具備自己的主體性。在廢名的正視與理解中，陳聾子、王老大、四火、張七等人，皆具有了鮮活的個人生命，作為獨立存在的「個體」獲得了主體性。

（三）（隱含）作者的後退：「個體」的浮現

在對「反思型懷舊」的論述裡，博伊姆指出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的關聯，無數的個人記憶構成了駁雜的、無序的集體記憶，集體記憶又總是喚醒個人的記憶，引起個人動情的回憶，懷舊由此生發。[27] 集體記憶總是和家園密不可分，或者說，集體記憶即是家園的記憶，是個人記憶的集合，所以博伊姆說當離開了家園，或者家園所象徵的集體、群體即將隕滅，個人便會注意到記憶之集體性架構。[28] 博伊姆進一步指出，個人是在哀悼之情緒中重新發現了家園之集體性架構的，[29] 廢名最初對故鄉的回望乃是哀悼失去的愛情、親情，失去的童年，失去的故鄉。博伊姆也認為，「隨著『悲傷作用』所需時間的過去，哀悼之情也就過去」，而「反思型懷舊是一種深層哀悼的形式，它通過深思的痛苦，也通過指向未來的遊戲發揮悲痛的作用」。[30] 從《竹林的故事》到《桃園》、《棗》，廢名已不再是那個初登文壇的青澀的作家，青春的知識分子對故鄉的哀悼結束，而以一份更成熟的情感安置自己對故鄉的懷想，同時以一個成熟的知識分子的

[27] 博伊姆認為懷舊是集體記憶與個人記憶的某種中介，集體記憶雖然是一個混亂的、不系統的概念，但可以作為一種現象學來描述人類經驗。參考〔美〕博伊姆著，楊德友譯：《懷舊的未來》，頁 60-61。

[28] 同前註，頁 62。

[29] 參考邢辰：〈從「憂鬱-哀悼」之生命轉向論廢名《竹林的故事》及其創作傾向〉，頁 41-56。筆者在論文中指出廢名第一部小說集《竹林的故事》之哀悼傾向，這是廢名第一次回望故鄉。

[30] 〔美〕博伊姆著，楊德友譯：《懷舊的未來》，頁 62。

眼光展開對故鄉的反思。體現在小說文本中的，便是（隱含）作者的後退，[31] 他的情感變得深邃、理性起來，與故事、人物甚至是敘述者，都拉開了一段距離。[32]

以短篇小說〈竹林的故事〉與〈桃園〉為例，二者均描寫了一個美麗的故鄉盛景，前者是竹林，後者是桃園，竹林里生活著三姑娘一家，桃園裡生活著阿毛和父親，此二者都是廢名對故鄉風景上與人情上的美麗想像。但在〈竹林的故事〉裡，作者廢名是沉浸於故事中的，這不只體現在第一人稱敘述者作為旁觀者參與故事，更大程度上表現於敘述者在成年後再次遇到三姑娘，物是人非使其傷感，在〈竹林的故事〉結尾，廢名這樣寫道：

> 到今年，我遠道回來過清明，陰霧天氣，打算去郊外看燒香，走到坝上，遠遠望見竹林，我的記憶又好像一塘春水，被微風吹起波皺了。正在徘徊，從竹林上坝的小徑，走來兩個婦人，一個站住了，前面的一個且走且回應，而我即刻認定了是三姑娘！
>
> 「我的三姐，就有這樣忙，端午中秋接不來，為得先人來了飯也不吃！」那婦人的話也分明聽到。
>
> 再沒有別的聲息：三姑娘的鞋踏著沙土。我急於要走過竹林看看，然而也暫時面對流水，讓三姑娘低頭過去。（頁 124）

與〈柚子〉、〈鷓鴣〉、〈去鄉——S 的遺稿——〉等前期的鄉土小說相似，〈竹林的故事〉的結尾，敘述者亦遭逢了記憶中的對象。在這些第一人稱敘述者的小

[31] 本文所採取的的隱含作者之概念來源於韋恩・布斯（Wayne Clayson Booth），布斯指出當一個作者完成一部作品時，他亦完成了一個作者，這個作者即是隱含作者。筆者亦認為，寫作每部作品的廢名都是不一樣的廢名，因此以隱含作者名之。

[32] 韋恩・布斯在《小說修辭學》中提出「距離」之概念，並認為距離（distance）存在於隱含作者、敘述者、人物和讀者任何的兩者之間。參考〔美〕韋恩・布斯著，付禮軍譯：《小說修辭學》（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163。

說中，（隱含）作者廢名大致上是與敘述者重合的，因而敘述者在小說結尾的哀傷即是（隱含）作者廢名的哀傷，如此，廢名在寫作此篇小說時便與小說中的故事無甚距離，這是由（隱含）作者的年輕、氣盛，感情強烈、飽滿所決定的，筆者在前面所述第一人稱敘述者並不是（隱含）作者沉浸於故事之主要原因，即是因此之故。此處可由廢名小說集《棗》中之短篇小說〈小五放牛〉稍作討論。〈小五放牛〉同樣是以孩童小五作為第一人稱敘述者，但（隱含）作者廢名與故事之間卻有一段很大的距離。原因在於成熟的作者變得理性起來，感情不再如前期一般外露。〈小五放牛〉中，（隱含）作者廢名與敘述者小五並不是貼合的，易言之，二者是相互獨立的個體，小五是小五，廢名是廢名，（隱含）作者並未參與、干預故事，而是處在故事之外。但對〈竹林的故事〉來講，敘述者「我」與（隱含）作者廢名卻幾乎是同一個人，（隱含）作者借敘述者「我」來追憶過往的經歷、重溫舊日的美好，（隱含）作者裹挾於故事之中，因而他的視角是局限了的，文本中便也只能傳達著他的哀歎與惋惜之情。故而，在（隱含）作者之個人感情干預敘事的前提下，《竹林的故事》中的人物皆被其時的廢名之個人感情遮蔽，小說中的人物之主體性便被削弱了。

〈桃園〉則不然。如果說〈竹林的故事〉之（隱含）作者是以自己的視角來哀悼失去的美麗歲月（自然，三姑娘是哀悼的主體），那麼〈桃園〉之（隱含）作者則是以阿毛、王老大二人之視角表達底層人對幸福生活的嚮往、對貧苦生活的無奈。那麼，在這一層視角之上，（隱含）作者之視角則是對王老大父女的同情，更深一層，則是對鄉土的反思。在〈桃園〉中，（隱含）作者廢名獨立於故事之外，與故事保持了較大的距離，這也是為何〈桃園〉沒有哀傷、沒有歎息，成熟的知識分子以更加理性的眼光回望故鄉、反思故鄉的美與醜。若將小說譬喻為圓圈，〈竹林的故事〉之（隱含）作者處於圓圈之內，〈桃園〉之（隱含）作者則處於圓圈之外，但這個「外」是與圓圈同處一個平面，而不是置於其上的

另一個平面。《桃園》、《棗》中其他以鄉土為背景的小說亦如此，這亦反映出廢名在面對故鄉時的成熟。

以上是縱向的觀察，若以橫向比較來看，即以廢名早期追隨的對象魯迅為例，廢名與魯迅都是寫作鄉土的高手，後者以〈祝福〉、〈故鄉〉等小說開創了二十年代中國鄉土小說創作的先河。魯迅的小說即如詹明信所言，是民族寓言的寫作，不啻〈狂人日記〉、〈阿 Q 正傳〉，〈祝福〉亦是一則民族寓言。〈祝福〉講述了知識分子「我」回鄉遇到改變巨大的祥林嫂，因而勾引出「我」對祥林嫂的記憶，以及鄉人對祥林嫂故事的補充。魯迅以祥林嫂的悲慘故事控訴中國的「吃人」的封建禮教，祥林嫂無疑是魯迅為中國人塑造的一則寓言。寓言之後是如果不改革、不破除孔教，每個中國人都是祥林嫂的命運。但廢名的小說卻不盡如此，除卻前一節中提到的〈石勒的殺人〉與〈審判〉之外，廢名的小說再無寓言化的書寫。寓言關注的是整體，是將個人放置於整個社會架構之下，在寓言裡，作者對個人的關心、同情是建立在對整個國家、社會的省思之下，因此寓言化的書寫是一種宏大敘事視角，魯迅的小說即是如此。但廢名在小說中更為關注普通人的內心、普通人的生活，魯迅寫祥林嫂實際上是在寫中國社會，廢名寫阿毛、寫王老大，則是真正地、真實地在寫這兩個生活在鄉村中的父女。如此說來，廢名實際上是貫徹了周作人之「平民的文學」主張：以真摯的文體、思想記述普通人的悲歡成敗。[33] 從這一層面上來說，廢名從追隨魯迅到與魯迅分裂，實在是有跡可循。從文學思想上來講，廢名與魯迅的主張便不相同，一個擁抱社會的改革、國家的運命，一個著眼於普通人的生活、情感。在魯迅那裡被抹殺了的「祥林嫂」之「個體」的悲哀，廢名在其小說中還之。

[33] 參考周作人：〈平民的文學〉，周作人著，止庵校訂：《藝術與生活》（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4-5。

1957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廢名小說選》，其中收錄了《桃園》與《棗》中的部分小說，時隔將近三十年，廢名重看自己的舊作，指出它們是自己對中國的生活的觀察：

> 在《棗》裡選了〈小五放牛〉、〈毛兒的爸爸〉、〈四火〉、〈文公廟〉，這些短篇小說的語言我今天看來很有些驚異，認為難得，也表現了生活，一個角落的生活。我記得我當時很愛契訶夫的短篇小說，我的這些小說，尤其是〈毛兒的爸爸〉，是讀了契訶夫寫的俄國的生活因而寫我對中國生活的觀察。[34]

「一個角落的生活」正是一種「客觀」文學觀的踐行。筆者雖以「客觀」文學觀來概括廢名的書寫，但廢名的「客觀」並非冰冷的記述，而是能夠將鄉村人情灌注進作品，這樣的鄉土不再是知識分子政治意識形態與作家情感意識形態觀看之下的客體，鄉土自有的倫理人情煥發出來。因此在廢名的書寫中，他凸顯鄉土人物個體，也即是凸顯了作為個體的鄉土，賦予前者，亦是後者一種主體性。我們看到，在《桃園》與《棗》之鄉土小說中，廢名一方面以成熟的知識分子眼光回望故鄉，褪去了青澀的情緒的對文本內人物的擁抱，在一定的距離之外歸還人物的主體性；另一方面廢名作為作者與小說人物保持一定距離的寫作方式，正是他「客觀」之文學觀的實踐，在「客觀」書寫中呈現鄉土「個體」之悲歡離合，不避諱鄉土的美或醜，具有鮮活個人生命的鄉土人物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由此浮現。

[34] 廢名：〈序〉，《廢名小說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 年），頁 2-3。

五、結語：「知道你自己」

廢名在《跟青年談魯迅》中表現出對魯迅小說〈孔乙己〉的偏愛。在《呐喊》與《彷徨》之中，為什麼是獨獨是〈孔乙己〉得到了廢名的讚賞？廢名說：「我們只是說〈孔乙己〉這一篇的白描是魯迅對生活的寫生（作者當然有其畫家的微笑與同情），在《呐喊》與《彷徨》裡具有獨特的風格。」[35] 這就是了，「對生活的寫生」即是廢名面對創作的態度，不在文學中表現個人的意識形態，追求一種「客觀性」，在「客觀」之中，蔭蔽在作家羽翼之下的「個體」得以浮現。

本文以「個體」為論述焦點進入廢名 1927-1930 年間的兩部小說集《桃園》、《棗》。文章首先在「感時憂國」的脈絡下審視廢名回應三一八慘案之小說，發現廢名雖然不可避免以寓言闡發自己的「感時憂國」熱情，但在具體的書寫中卻傾向於關注孤獨的清醒者、革命者，體現其對先覺者個體的同情與理解；文章次節由廢名二十年代書寫知識分子日常生活之小說，探討廢名對知識分子個體思考之轉變，即將筆觸對準知識分子社會身份之外的另一身份——日常身份，這個個體是普通的、平凡的，屬於家庭、倫理、日常生活。至此，廢名對「個體」的關注由前期作為社會的知識分子之同情、理解轉向了對身為普通人的知識分子在日常生活中的糾葛、齟齬之反思。文章最後一節由廢名「客觀」之文學觀帶入其鄉土書寫，在兩重視角的鄉土——純美與破敗之中呈現相對「客觀」之鄉土，而因作者主動退後、與人物保持一定距離的寫作方式，人物得以不再是作家個人情感的依託，亦不是國民社會的背負者，鄉土人物作為獨立「個體」由此浮現，是故，廢名鄉土小說中的人物具備了「主體性」。

[35] 廢名：《跟青年談魯迅》，收入王風編：《廢名集（第 5 卷）》，頁 2501。

在《駱駝草》的「閒話」欄目中，廢名談到「知道你自己」這一句老話，並由此想起一件往事：

> 記不清正在那裡幹什麼，好像是預備來情書一束的，忽而受了什麼刺激，很英雄，要投筆從戎，誠誠懇懇的去請教於老師，老師婉勸道：「希臘有一句名言，『知道你自己。』人大概是有所長，有所短，甲做甲的事情或者有點用處，若去做乙的事，未必於事有濟。」[36]

廢名幾次談到自己要投戎卻不得之事，並最終表現出對自我選擇之自信，可見其已「知道他自己」，從文本內至文本外，這是否又是他自己的主體性呢！

[36] 廢名：〈閒話〉，王風編：《廢名集（第 3 卷）》，頁 1207。

徵引書目

近人論著

（一）專書

王風編：《廢名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藝術與生活》，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DOI:10.978.75553/61541

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 年。DOI:10.978.962996/6669

陳平原：《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陳建軍編著：《廢名年譜》，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年。

陳振國編：《馮文炳研究資料》，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 年。

廢名：《廢名小說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 年。

蘇敏逸：《「社會整體性」觀念與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發生和形成》，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7 年。

〔美〕博伊姆（Svetlana Boym）著，楊德友譯：《懷舊的未來》，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 年。

〔美〕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著，張旭東編，陳清僑等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年。

〔捷克〕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著，李歐梵編，郭建玲譯：《抒情與史詩：現代中國文學論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0 年。

〔美〕韋恩・布斯（Wayne Clayson Booth）著，付禮軍譯：《小說修辭學》，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二）期刊論文

王曉明：〈一份雜誌和一個「社團」——重識「五・四」文學傳統〉，《上海文學》1993 年第 4 期，頁 65-76。

邢辰：〈從「憂鬱-哀悼」之生命轉向論廢名《竹林的故事》及其創作傾向〉，《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 54 期，2021 年 6 月，頁 41-56。

武斌斌：〈廢名與魯迅：「主觀」的選擇與「無意」的影響〉，《中國文學研究》第 4 期，2016 年 4 月，頁 88-98。

張文濤：〈國民革命時期的「智識階級」論爭——從「打倒智識階級」的口號談起〉，《人文雜誌》2014 年第 9 期，頁 80-87。

（三）報紙

也斯（梁秉鈞）：〈廢名與胡爾夫〉，《大公報》第 12 版，1988 年 12 月 5 日。